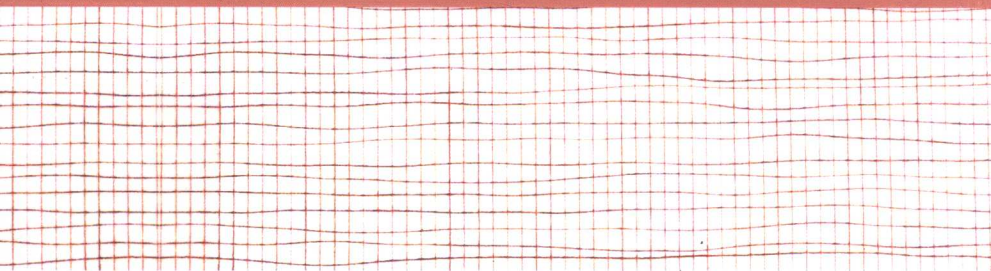




部落化生存

新媒体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刘凯 / 著





部落化生存

新媒体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刘凯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部落化生存：新媒体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刘凯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11

ISBN 978-7-5426-5713-8

I. ①部… II. ①刘… III. ①传播媒介—影响—社会关系—研究 IV. ①G206.2②C9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3458 号

部落化生存：新媒体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著 者 / 刘 凯

责任编辑 / 冯 静 郑秀艳

装帧设计 / 汪要军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9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8

书 号 / ISBN 978-7-5426-5713-8/G · 1442

定 价 / 3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序 言

书稿提笔之时，中国正处于一个多彩纷呈的时代：一方面是社会阶层逐步分化重组，多种利益交织汇集，共同构成了转型期的多元化景观；另一方面，社交媒体攻城略地，不仅交织了主流非主流的舆论阵地，也极大扩充着每个人的社交属性，颠覆传统的人际关系连接方式。此时，互联网思维的呼声统领了各行各业，各种形态的“互联网+”新经济模式喷薄而出。时下多用“转型期”这一流行词语描述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如果我们细分社会的每个层面，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巨大结构性转折，这种转折点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影响到每一个人。新媒体此时成为这个转折点的重要表演舞台，并且发挥着推动、催化的重要作用。

自原始社会人类群居开始，人际关系成为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在农业社会时期，人类的交往、联系的经济本质是在有限区域内的资源争夺，由此衍生出了民族、国家的关系单位。工业化不断推进，物理空间的限制逐步被打破，为了满足大工业生产需要，人们从原来的“世外桃源”被迫离开乡土进入到了城市，彻底改变了原有的人际关系结构。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更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变化，人际关系模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我们进入了“新部落”时代。

在新形势下，社会变迁使得权力逐步呈现分化的状态，政治权力结构逐步退却给社会，新媒体在不断消解、分化政治权力。在经济方面，从农业社会时期熟悉化市场逐步转向陌生化市场，陌生化市场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或者根基就是信任。信任的重要性在新媒体阶段得到了极大诠释。没有信任基础的存在，信息交流就不能够存在，从而衍生出的虚拟社区就得不到有效保障。社会逐步分解成为一个多元的利益、思潮集合体，这些分化密集、快速在新媒体上得到了展示，这种景观是以往中国社会所不曾有过的。精英文化开始消解，草根文化的崛起固然有赖于社会整体权力结构分化影响，但是媒体提供给公众的表达诉求平台力量仍然不可忽视。

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关系”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在国外学术著作翻译中，“关系”被翻译为“Guanxi”，由此可见在西方学术视域，中国的关系社会不同于西方。我们建立在“情理法”权衡量基础上的关系网络，具有丰富的内涵，以至于我们带来了具有亲情味道的管理模式，同时也带来了“制度失灵”的尴尬。我们这种带有明显的“民族特色”的关系类型，是否会在新媒体时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结构是否会影响性质？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支持者认为新媒体所带来的是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彻底颠覆中国一切的传统；反对者认为“关系”的内核是不会改变的，它是一个基本存在，所改变的只是借助新媒体平台变化了的形式而已。

当人们在拼命地扩大自己“朋友圈”的时候，所给个体带来的是关系的机遇与迷茫并存的现实。一方面我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收获了人际关系网络扩大所带来的各类社会支持，同时面临着纷繁的关系类型及不同交流情境，人们如何自处并保持一份自我空间？数字化时代的生存所带来的远非便利的传播方式，在更大程度上的结构变迁正在深刻地重塑我们的社会。虚拟部落社会的形成，首先带给

管理者的是管理的困惑。当我们熟悉门对门、户对户分块的管理思维后,如何面对网络的流言蜚语及复杂的舆情现象?如何对不知其踪迹的虚拟行为进行监管?

我们的社会从部落到族群,再到国家,经历了一场以认同、文化、情感为纽带的成长,这种成长随着全球化的全面深入戛然而止,随着西方学者所描述的历史终结而最终世界变平了。工业化城市化首先把我们变成了原子化,原子化后人们重新渴望社区的重构,新媒体平台无疑成为了人们在离散时代建立精神家园、聚类群居的诉求。我们重新聚合成了带有部落色彩的虚拟社群,仍然以兴趣、文化认同、情感为纽带,完成了螺旋式上升的人际关系升华。

人类生活的改变,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理论界的导向。正如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进程和大都市生活的常态化,催生了芝加哥学派的诞生。同样,新媒体的兴起正在改变着学术的版图。从社会学到传播学,再到经济学,人们所关心的是新技术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无论哪个学科,在对新媒体研究的理论切入点上,都离不开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新媒体对社会结构及人际关系的改变,它的影响会渗透到何方?

带着这个命题,本书首先勾勒描述了网络社会的结构特征,紧接着分析人们在虚拟部落中如何进行社会化生存。人们“部落化生存”势必对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本书对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尝试提炼出来人们实践“部落化政治”,参与新型网络经济,创造并消费网络文化的基本规律。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超越媒介：社会关系变革的力量	1
第一节 社会关系变迁的逻辑	3
第二节 互联网：一种综合性的力量	19
第三节 社会关系变化的本土的逻辑	25
第二章 网络社会的特征	31
第一节 关系运作层面的差异	33
第二节 网络社会的关系结构	40
第三节 网络社群类型及结构	51
第四节 “小世界”网络的想象力	61
第三章 个体的部落化生存	66
第一节 启蒙平台：个人的现代化	66
第二节 个体网络的结构变化	70
第三节 自我表露的延伸	73

第四节	个体行为的网络化	80
第五节	个体跨群与多向度形成	87
第六节	个体社会资本的成长	91
第七节	无边界部落：网络对个体的负面影响	96
第四章	部落化的经济形态	101
第一节	网络社会的经济逻辑	102
第二节	社群经济：部落化集市	122
第三节	本土化讨论：新型经济组织对传统机构的影响	135
第五章	部落社会思潮及政治参与	141
第一节	公共论战：部落间的政治战争	142
第二节	部落政治诉求兴起	161
第三节	部落文化与政治传播悖论	168
第六章	部落社会的文化特征	181
第一节	文化生产与功能变迁	183
第二节	部落化社会形态下的文化特征	195
第三节	部落话语的构建	207
第四节	撕裂与统一	220
第七章	本土化讨论：激进与融合	225
第一节	当“关系”遇上新媒体	226
第二节	部落内的社会流动	232
第三节	从超稳定社会到剧烈变化	238
主要参考文献		241

第一章 超越媒介：社会关系变革的力量

十七年前，曼纽尔·卡斯特尔以其深刻的洞察力预见网络社会的崛起。彼时的“网络社会”在公众视野中，仍然是一个充满了科幻色彩的名词，因为当时我们的社会关系状态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在他的视野中，未来的生活是一个全新的、充满了无数变量可能的时代，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以及人的精神状态都全然与当下不同。“技术并未决定社会，技术就是社会”的断言在今天逐渐变成了现实。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实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卡斯特尔的预期，互联网展示出来的巨大社会改造能量也让研究者措手不及。

今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互联网是一个十分庞大且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它早已远远超出“一项技术、一项发明、一种媒介”范畴，犹如扩散的乙醚，在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处不在，同时又像一只“上帝的手”，从各个层面不断重新塑造着世界。本书并无意为“技术决定论”做注脚，我们只是在冷静、客观观察这个社会的同时，思考新技术带给了我们什么，我们社会中某些东西是否会改变，改变的逻辑是什么，这些新现象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互联网之于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社会学者对新媒体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对

人际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比如互联网让我们更加疏远还是亲密？更加孤独还是团结？它能帮助人们建立强关系吗？它是否能够连接边缘群体等等。无独有偶，中国的社会学者和传播学者接触新媒体研究课题之初，也将目光聚焦于其自身独有的“媒体属性”，这并非东西方学者的眼光和预见性不谋而合，而是新媒体发展轨迹的模糊性和不可预测性导致了研究具有天然的偏向。如果我们从传播学角度出发，将互联网定义为“一种新媒介”的话，很多问题就无力解释。本书首先立论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互联网已经超越了媒体属性，它是我们信息化时代最具活力的“社会性通用工具”。它从重塑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开始，变革能量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如果仔细梳理过去十年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宏观形态，我们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窥见其内在逻辑。

十年前，中国的电子商务刚刚起步，社交网站还没有出现，更遑论微博微信和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 O2O 应用。人们那个时候沉浸在网吧或者家里，在键盘上聊着陌生人，玩着游戏，浏览着形形色色的新闻，相比于现在，那是一个网络的“慢时代”。彼时，人们对网络的态度是新奇和惊恐并存。由于滋生了大量网瘾少年，网络色情和暴力长期存在导致新媒体的形象从一出生就带着几分“原罪”。当时的互联网更多体现出来的是媒体属性和娱乐工具属性。

在短短十年间，互联网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它像疯长的巨人一样，不断滋生出新的躯体和枝干。在经济领域，以电子商务崛起为代表，中国互联网在教育、医疗、金融、贸易、零售等领域开始发力，对传统行业的改造日新月异，“颠覆、改变”成为了互联网创业者们的号角和口号；在政治领域，以网络论坛和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为代表，公民性和公民意识日益觉醒，人们表达着自己的政治观点，多种政见思潮同台竞技，调侃、高论和诋毁并存；在社会领域，虚

拟社群的诞生无疑是社会组织方式的最大增量变化，它不仅是新型的人际连接工具，而且在更广的层面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产业改变的背后，则在悄然瓦解着传统人际关系结构，人们的链接方式更加复杂多元。

基于上述，在互联网视野下考察社会关系的变革，必须突破单一视角的局限，从互联网在社会功能中的作用入手，全方位考察其对社会关系的变革性影响，因此，我们应当建立一种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待互联网。

第一节 社会关系变迁的逻辑

社会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分支系统，直到近现代才出现了清晰的研究范畴和概念系统。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开始，社会关系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马克思以生产力发展形式和阶段为主线，多社会形态和结构进行了系统的划分，韦伯则从宗教文化提出了社会前进和发展形态的根本动力。除此之外，还有地理学说、人类学说、历史学说等等。我们如果认真深入分析社会发展历史，就会发现：人类每次重要的社会关系变迁节点，都有一种综合性的力量在起着极大作用。

学术界对社会关系发展与断代，存在多种理论切入视角。具体总结，主要有两种范式：以生产方式为主线划分社会关系结构差异；以所处时代的媒体特性为划分依据。这两种范式无所谓对错优劣，研究者仅仅是从自身理论体系出发，对同一个问题进行了不同的阐述。本书通过对不同理论视角进行了梳理和简单总结，尝试从先行者的理论视野中，找到本书研究问题的解决路径，同时也尝试建立一种综合化的理论体系。

一、经济基础与生产方式范式

马克思以生产方式及经济基础为切入点，阐释社会冲突对立的关系的理论，这种思维范式一直以来是中国学界主流，其研究对象更多指涉宏观社会结构，理论体系的内涵核心逻辑是：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社会生产组织方式，进而影响到了宏观社会结构。例如剑桥学派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大规模的治水和灾害防御是经济客观的要求，大规模集体协作导致社会关系结构的中央集权化。莎士比亚笔下互相算计的“威尼斯商人”与其商贩经济密不可分，陈忠实笔下争斗不息的宗族冲突深深根植于农耕文明……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人际关系的形态是由于其生产方式和经济环境所决定的。

生产力范式对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关系结构有着明确的断代划分，贝尔就以工业化为基本点，将社会结构的分化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不同的社会是依据不同的中轴建立起来的。前工业社会以传统主义为轴心，社会关系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工业社会以经济增长为轴心，人际关系依附于社会大生产；后工业社会以理论知识为中轴，科技精英成为社会的统治人物，个体因素在社会关系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按照贝尔的逻辑，从社会关系角度，我们亦能窥测不同时代的差异：农业社会时期，人们沉浸于封闭、高度熟悉化的社会关系中；工业化时期，以大生产为轴心的社会运作机制将人群撕裂成为碎片，进入原子化时期；后工业时期，个体多层次嵌入了多个生活、工作团队，形成了一种簇状原子结构的关系网络。贝尔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互联网并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贝尔认为的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导力量，或者说统治力量，和马克思的断代分析不谋而合。

马克思在工业化初期提出的理论和贝尔在工业化中后期的洞

见,在互联网时代面临新的情况:当前的经济状态和生产组织结构明显呈现新的状态。“扁平化”的工作组织结构越来越凸显其能力和价值,“流水线和标准化”成为了生产力落后的代名词。同时社会新型力量的崛起使得这个社会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而不能够清晰明了地进行断代。“经济基础”理论范式基本上是以生产方式来对社会进行区分,一般来讲,主要有以下三种层面:

1. 农耕文明的封闭社会关系

农耕文明时期的社会特征如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当然，这也是中国人心中的理想社会模型：简单自然，浑然一体，寄托于山水田园而怡然自得。千百年来，中国的政治精英将其视为社会管理的最高追求。走出理想化的模型，从结构上看，农耕社会充斥着封闭感，缺少流动性，社会关系有着极高的密度且高度同质化。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均经历了相似的社会发展过程。费孝通将中国传统社会描述为“熟人社会”，威尔曼则用“小盒子”来比喻前工业化时期西方的社会关系。^{〔1〕} 由于农业社会流动性较小，人们生活的空间相对封闭，初级群体成为人们主要的社会环境。血缘、亲缘、地缘是彼时社会关系构建与维护的主要纽带。上述特征的出现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

农耕文明时期的生产力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式的简单再生产,社会分工简单,商业流通范围受到地域的限制,同样人口的跨地域流动不活跃,即使存在大规模集体劳作,其地域影响范围和失效周期也是有限的,如在农闲时期的治理河道、共同抵御异姓宗族

〔1〕费孝论述见《乡土中国》，威尔曼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考察多伦多郊区居民的社会网络，针对西方传统的紧密社区关系，用“小盒子”来形容传统的、高密度、高互动的社会关系形态。从本质上，东西方两种社会关系形态本质上是一致的，初级群体在此阶段是人的主要社会关系组成部分。

等,均是构成当时社会关系结构的重要联系纽带。对于皇权而言,简单的再生产并不能保证中央集权的统治,维系庞大帝国的秘密主要有两个:要害经济的管控和文化的大一统。

自西汉“盐铁会议”以来,中央实行严格的盐铁专卖,有效联系并控制了地方政权,确保中央权力的顺畅渗透。地方经济自足、要害经济全国管控的模式犹如一根绳索,将散落的经济体串联起来,构成了帝国统治的经济基础,一旦这个经济基础发生动摇,社会必将走向动荡。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一书中,有过这样的结论:

淮河流域的暴乱和秘密结社,实际上是来源于贩卖私盐的经济基础。作者通过对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基础分析,深入揭示了社会关系和其经济支柱之间存在的隐秘关系,并将这种社会冲突关系总结为经济上的“掠夺型策略”和“防御型策略”两种生存模式。这种研究是典型的微观个案性的经济基础范式。^{〔1〕}

无论是抵御型的策略还是防御型的策略,都是在中央管控经济背景下,公众作出的生存选择。正如裴宜理所观察的:淮河流域经常性发生自然灾害,地方无力应对,当救助不及时的时候,非法的经济行为便会成为公众的经济性抉择。中国历代王朝都很重视赈灾救助,中央权力在调动资源救助地方同时完成了公众对皇权的认同和权力再生产。

除了“中央—地方”经济模式力量外,文化枢纽的统合力则是极具本土特色。在中国,具有宗教意义的儒家文化更关注“人伦”,对人

〔1〕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第一版。

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和社会秩序做了文化上的规定，负责执行、监督“人伦”的是乡村文化精英、宗族势力。^{〔1〕}乡绅、宗族是基层权力的实际执行者，他们既是皇权统治上的一环，同时也是皇权和公众的隔离墙，长期以来，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观察到的：中国皇权不下乡，不是不想下乡，是在这种封闭社会结构中，根本下不了乡。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社会没有能够整合全民的宗教，地方文化自治是主流形态，地方自治深受经济模式影响，且呈现出丰富的形式，但是共同拥有儒家文化的内核。儒家文化则在很长时间内发挥着宗教的统合作用，它向地方文化不断渗透延展，构成了维系农耕社会结构的重要一环。

2. 工业化时期的原子社会结构

马克·吐温的小说充分描述了狄更斯所讲的“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的人际关系：物质相比较以前极大丰富，但是人与人亲情的冷漠，金钱至上主义。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关系总是处在一个躁动、分裂的状态。此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单纯，心中理想的田园被破坏，工业社会交往的社会规则取代了农耕文明，此时心灵鸡汤不可避免成为了人们的安抚剂。从微观来看，“本乡本土”在大工业生产中逐步瓦解，成为了工业化时代人们“乡土家园”情感寄托和对过去宁静的憧憬，大工业将基层社会组织撕成了碎片，碎片中的个体成为了“原子化”的个体。原本属于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丧失，让位于社会统一化的机构和组织。这种转变对个体的冲击是很大的，新型的社会连接方式出现了——高度职业化。“业缘”成为了工业化时代最好的社会关系构建方式。大工业时期的生产所有者和组织者成为这个社会最有权势的人，产业工人无

〔1〕“伦”本身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本节主要讨论“伦”运作的枢纽机制，关于其更具体的讨论请见本书第七章。

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社会的边缘性地位。这个时候人口的流动增强，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首先发生变化的是传统资源配置主体发生了转移。从宏观上看，东西方农业社会和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关系结构基本相同。但是在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阶段，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于中国来讲，政治力量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全球化、国际移民是改变社会形态的中坚力量。金耀基认为：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将比工业化、城市化和世俗化综合的影响更为剧烈。^{〔1〕}

就中国而言，自洋务运动以来，虽然中国工业化开始起步，范围逐步扩大，但是限于当时社会政治的现实，加之中国农耕文明的强大惯性，导致社会工业化进程缓慢，对关系结构的影响没有变革性意义，由于以农村为支柱的社会基础存在了很长时间，彼时社会关系主流还是乡土社会的特征。1949年后，中国启动了若干次中断、进展缓慢的工业化进程，国家力量是最为主要也可以说是唯一的组织者。以“工作单位”为依托，全国工业化进程全面展开，但是此时并不是自然状态下的工业化，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化受到了城市—农村双重国民管理体制的限制。高度行政化的单位制，使得个体构建关系的渠道被局限于单位之内，重回传统农业的封闭状态。国外对于此阶段的中国关系的研究过于集中在其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例如傅高义用“同志加朋友”的视角去分析政治、生活两个语境交叉下的关系构建。但是中国本土的学者从资源分配角度洞察了工业化时期及政治运动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孙立平首先从资源交换角度提出了“庇护性关系”：

〔1〕金耀基：“全球化、多元现代性与中国对新文化秩序的追求”，载周晓红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血缘和地缘关系在传统社会中占据重要位置是因为资源配置是按照这两个方向发生的。当国家机构、权威垄断了资源分配后,个人和个人之间的联系减少了,个人通过权威获取资源,努力同权威建立私人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结构是庇护性的,形成了庇护主义关系网络。〔1〕

“庇护性关系”模型其实恰好的描述了中国传统“关系”在工业化时期的融合状态。这种关系结构是星状发散结构,与西方的原子化社会结构不是很相同。

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孙立平所提出的“庇护性关系”很好地描述了1949年后国家机构对传统社会结构的资源垄断,权力渗透至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庭。传统的乡土社会已经不足以提供相应资源,政治体制导致资源配置的唯一性,中国家庭、宗族重要性下降,具有行政色彩的“单位”、“组织”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人际关系结构转向了“权威庇护性”的原子化状态,改革开放后,庇护性关系下降,出现工具性差序格局结构。〔2〕杨善华等人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改革开放后中国人际关系的变迁。如姻亲关系和拟血缘关系融入到了差序格局中,而且利益逐渐成为判断亲疏远近的标准。“关系”更加呈现出工具色彩。〔3〕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社会流动性增强,传统社区被打破,无论是西方战后的移民浪潮还是中国解放后的历次社会运动,都

〔1〕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年5月。

〔2〕本概念论述引自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载《社会学研究》1996年5月,文中所提出的“庇护性关系”恰恰体现了中国本土“关系”的重要维度,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将有详细阐述。

〔3〕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亲、亲情和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6月。